



【心径探幽】

仅凭公司名字就断言投资价值不值得是武断的,期待随便便把钱投给一个叫牛顿商业或普朗克科技的公司就能挣钱的想法无异于异想天开。不过研究公司的名字仍然是有意义的。

投资始于研究公司取名

吴捷径

研究一个公司,先从研究其名字开始。所谓人如其名,一个叫富贵的小孩,身上往往映射了父辈对财富的渴望,另一个叫巴顿的,父亲可能对二战颇有了解。公司亦是如此,只要创始人愿意将创办企业的愿景、世界观、价值观注入公司的名字,我们就得以对公司的初心和手段窥见一二。大江大河孕育着生命,川流不息。以大江大河命名的公司,创始人可能志存高远,胸怀天下。于是我们见证了亚马逊这样的世界级公司的崛起,也看到了李嘉诚的长江实业这样的华人翘楚屹立不倒。李嘉诚解释长实名字由来时说,长江不择细流。以长实几十年的经营业绩及股东回报而言,其当之无愧配得上这样的名字。

名字隐含强烈使命感、致力于提升社会效率、降低社会运行成本的公司,也往往脱颖而出,谷歌和拼多多就是其中的集大成者。谷歌的名字源于数学术语“googol”,指的是10的100次方,体现了公司希望让人们能够访问和管理互联网的海量

信息的使命。拼多多来源于“拼”和“多”的组合,公司的使命和愿景是通过拼团购物,让人们享受到更多的实惠和更多的乐趣。

取名致敬伟人尤其是科学家的公司,不少也都获得了成功,其中最显赫的例子当属特斯拉。尼古拉·特斯拉,奥地利美籍科学巨子,一生曾11次被授予诺奖,九次让贤,两次拒领。纵观诺贝尔物理学奖历史,受其直接启发而获奖的科学家占27%,间接启发获奖的人数超过65%,这导致他75岁生日时,收到了8位诺奖得主的感谢信。早在1898年,特斯拉就已经建议建造和推广自动驾驶车辆。马斯克的取名呼应了人类历史关于自动驾驶汽车的最早预言,可谓神来之笔。

与上述几种正能量取名背道而驰的很多取名方式,在现实生活中相当普遍,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根本没有思考过这是是否旁门左道。

最常见的一类取名与风水及玄学有关,名字中多带福、旺、汇(水为财)等字,在广东、福建等流行风水的地区尤其盛行。这类企

业信奉形而上学多于商业本质,取名已经反映了其容易为旁门左道吸引的品性,注定难有商业上的终极成功。如果我们把广东、福建最为成功的企业列出来,如华为、腾讯、美的、宁德时代、安踏等,就会发现它们竟完全见不到任何风水与玄学的影子,而那些热衷于此的企业,过段时间看慢慢就不见了,如过眼云烟,终南柯一梦。

对知名公司采用磁觉法取名的公司不在少数,这样的公司从出生开始,骨子里就带着想走捷径的心,不肯老老实实去啃品牌长期建设的硬骨头,妄想以擦边球的方式,利用对知名企业品牌、商标的相似度,快速把销售做起来。世界上最牛的玩具生产商是乐高,A股有家玩具公司就对乐高采用了磁觉法取名,从2018年开始,这家公司的营业收入开始逐年萎缩,各种监管函更是收到手软。见茅台1935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公司也急忙推出了XX1935,连酒瓶的颜色和设计也高度仿真。这些公司终会发现,捷径其实是最慢的路,而且最后常变成绝径。

还有一类公司非常霸气,名字

里含有大、王等类似字眼,一看就野心不小,但结局往往令人唏嘘。至少在5000多家A股上市公司里,我们很少见到该类公司做成知名企业的同时受到社会的广泛尊重,反而是在退市股票和ST股票里见到了其身影。其大胆选用张扬的命名,折射出鲁莽、傲慢、缺乏常识和敬畏之心的动机和初心,时间一长,失败自然而来。

当然,仅凭公司名字就断言投资价值不值得是武断的,期待随便便把钱投给一个叫牛顿商业或普朗克科技的公司就能挣钱的想法无异于异想天开。那么,研究公司名字的意义在哪里呢?笔者觉得主要有三点:

其一,从公司多用心取名,我们就可以窥见公司有多用心在做产品。步步高当年取名,是采取了有奖征名的方式,从数万个候选名字中,精挑细选甄别出来的。沃尔玛的取名,更是公司成本至上理念的体现:山姆·沃尔顿(Walton)希望用自己的名字加上Mart为公司命名,但如果从Walton里只取一两个字母会显得单薄,6个字母全取,门店招牌或广告牌的长度会更长,日常耗电

更多(比如霓虹灯的电费),最后折中取了Wal三个字母,组成了Wal-Mart。

其二,公司成功后品牌已广为人知,如更改代价太高,由此,不像财务报告可以造假和美化,代表公司初心的命名很难篡改(不断更名的公司通常名字及品牌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不珍视)。于是,投资者便可以公司漫长的历史与命名背后的价值观比较,看公司是一直在坚守初心还是不断风格飘移,由此得出公司诚信、战略定力等方面的定性判断。

其三,为投资者充当最初的滤镜。投资的世界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投资人最宝贵的资源就是时间。当我们看到一家公司取名“永恒的大”时,我们大概率推测,其未来将谱写一首波澜壮阔的债歌(举债之歌),其大概率会把汽车开得比车灯还快,这样的公司,连花时间去看一眼报表,都是多余。而当我们瞄到另外一家叫稳健葫芦的公司时,我们大概率觉得,这家公司或许值得仔仔细细再往下翻翻,看看葫芦里面究竟卖的是不是好药。(作者系资深投资人士)



【磊哥说书】

对于神宗启用王安石,当时吕晦极力反对,指出王好固执己见,喜用阿谀奉承之人,敏于理论而疏于实践,一旦大权在握,天下必受其祸。事后看来,王安石为人处世基本如此,而变法诸举措不仅全部失败,且扰民甚深。

变法的人和事

郑磊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次重要制度变革,谈到宋朝历史,很难不涉及这个话题。近两年,这方面的历史研究作品迭出,笔者看过不少。吴钩新著《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的特点是引用了大量来自当时历史人物的个人文献记录,对变法举措的出台、推行、争议作了极细致的描写,还原了保守派与变法派间火药味十足的攻防战。

王安石变法的背景是北宋受“三冗”拖累,财政陷入困局,变法主要目的是解决政府财政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安石变法与汉武帝时期的桑弘羊变法如出一辙。作者依照惯例将当时的历史人物分为两大对立派别:保守派主张循旧路,节流到底;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则主张开源,提出“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理财大纲,深得天子宋神宗的支持。王安石围绕富国、利民、强兵,打破北宋初年形成的皇权、相权和谏议权分离,既协商又有监督的治理架构,通过设立新机构打破制衡,强行推出青苗法、募役法、市

易法等颠覆性的变法举措。这部书围绕变法主线刻画了当时众多历史人物的所思所想、所做所为。

“变法”是指改变旧法、破旧立新。与改革不同的是,变法是中性词,比如王莽、康有为,都曾经以变法之名改弦更张,将变法等同于改革,是修辞导致的认知偏差。在这个维度上,我们可以根据当时卷入变法过程中的人物的说法和行动,重新梳理这一重要历史事件。

当时被视为主要反对派的司马光、韩琦、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人,极少用“祖宗成法不可变”这类迂腐说法作为反对变法的主要理由。其中甚至很多人初期参与了变法政策的制订,中途改变立场,退出变法阵营。如苏轼弟弟苏辙曾担任过变法政策主要起草人,坦率和王安石讨论过青苗法的问题,指出官吏难免上下其手,无论是富裕人家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很难避开盘剥,官吏为了完成放贷任务,还会采取各种强制手段,为基层政府带来更大麻烦。事实上,青苗法在推进过程中,多地官员不愿配合,有些还向朝廷提出明确反对。御史李常奏报“今百姓之室,空匮已甚,苛峻巧削,日入于穷困。困

穷之至,为盗而已矣”,司马光说“臣恐细民将不聊生矣”。苏辙也曾向神宗指出均输法必然引发行賄贪污,商贾的利润改由政府收取之后,物价反而会会上涨,预言会“谤议腾沸,商旅不行”,均输法必然失败的结局。事后看来,这些反对变法的官员预判的问题确实发生了,甚至比他们所说的更严重。

如果以变法结果看当时反对变法的人的立场,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对于神宗启用王安石,当时吕晦极力反对,指出王好固执己见,喜用阿谀奉承之人,敏于理论而疏于实践,一旦大权在握,天下必受其祸。事后看来,王安石为人处世基本如此,而变法诸举措不仅全部失败,且扰民甚深。吕晦可谓识人,并非诽谤虚妄之言。其他诸人就事论事,预先提出的对变法后果的担忧,最终也都变成了现实。

宋神宗是变法的强有力支持者,接到众多大臣反馈变法遭遇困难的信息之后,也曾有过几次犹豫。作者将其塑造为有为皇帝,却难辞负有急躁推进变法的责任。正如苏轼曾直谏“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建

议“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听后悚然,表示“朕当详思之”。熙宁七年下诏征集官员意见,提问天灾是否因“赋敛失其节”、“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议”、“商贾不行”,均输法必然失败的结局。事后看来,这些反对变法的官员预判的问题确实发生了,甚至比他们所说的更严重。

对王安石抱有负面看法的并非只是那些典型的“守旧派”人士,如说过王安石“大言滔滔,诡论灭世”的苏轼。他指出王安石很有可能重蹈桑弘羊覆辙,导致“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变法结果也证实了“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的结果。即便王安石曾经的学生郑侠等,甚至他的亲兄弟王安国也最终站在了反方,而与变法没有太多利益关系的皇室成员高太后、曹太后、皇帝赵顼也说“王安石变乱天下”。乾隆曾点评王安石非“正人”君子,对“宋室治乱安危”负有责任。

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屡次遭遇人才不足难题,起初他邀请了很多饱学能干的官员,或者礼貌推

拒,或者短时间共事之后就退出了。起初王安石也意识到变法不能过急,规劝神宗“天下但见朝廷以能者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恐风俗坏,不胜其弊”,而后期则宁可用有能力但品行有瑕疵的官员,期望在变法取得效果后,能够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进来。书中一些事例真实反映了王安石的为人处世之法。为了扳倒一个不满变法的负责皇宫礼仪事务的小官李祥,王安石不惜多次告病辞职,神宗也多次让步,最终将此人人外放他地。

读者依靠这本书提供的历史资料,不难得出对变法和反变法主要人物的观点。不足之处是,作者对文献的解读和人物臆断带有明显倾向。作者将不利于变法的人和事都放在“反方”,尽管没有引用变法造成社会经济损失的客观数据,仍很难将一个几乎引起了大部分官员反对,和民间非议不绝的变革美化成不顾守旧势力阻挠的锐意革新。这既不符合逻辑,也违背了人们的常识。无论初心还是结果,一切变革应有利于大部分人才才能成功,这是历史铁律。(作者系深圳经济学者)



【念念有余】

在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看来,那些金发碧眼的人不过是货物的搬运工,他们带来的那些武器可以为我所用,但并不足虑。

大航海时代的中西对抗

余胜良

读史可知,大航海时代(大致对应中国历史的明清之交)崛起的强国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对整个亚洲大陆的影响有限,从军事上看,他们在和东行政权的交战中落了下风。

明朝名臣徐光启受到利玛窦影响,知道海外武器先进,主张邀请葡萄牙人训练明朝新军(这有点清末名臣按照海外军事建制训练清军的意思),不过这支新军没有训练出来,被明朝毁约了,但是关宁铁骑使用的红夷大炮还是发挥了很大作用。很快,努尔哈齐麾下的清军也通过种种途径获得了新式武器制作方法,在更为灵活彪悍的指挥下,清军的这些武器成为打败明军的利器。

当时,郑成功集团作为明军的一支,攻打占领中国台湾的荷兰军队,荷兰军队对中国军队的

战斗力印象很差,中国军队基本上一打即散,这跟后来清朝军队面对西方军队以及民国时期面对日本军队的情况也相似。郑成功的军队比较有纪律,但是他麾下两万多人对荷兰军队的一千多人,还是打了8个月。

在郑成功集团割据台湾后,荷兰人寻求和清军合作,一起攻打台湾,但被清军拒绝了。

在明清之交时,西风东渐中,除了军队火器,也可以看到传教士身影。1644年,张献忠攻占了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当时在成都传教的意大利教父利类思和葡萄牙的安文思,记载了张献忠不少匪夷所思的做法。

在明清首次大战之前的100年,麦哲伦率领一个小型舰队完成了人类首次环球航行,将亚洲大陆和诸多岛屿首次跟欧洲国家连接起来。葡萄牙人随即来到了中国,在东莞的屯门被赶走,他们在和明朝

水师的交战中落败。1553年,葡萄牙人使用诡计占据了澳门。那时,在汪直的海盗队伍中,有葡萄牙人,说明葡萄牙人志在求财,有钱赚就好。这个海盗队伍是明朝倭寇海患的主力。

除了做贸易谋利,传教士以澳门为根据地,来到中国大陆,但是当时传教受到严格限制,传教范围有限。皇帝可以很容易驱逐传教士,甚至杀害教士和教徒。

日本人首次接触葡萄牙人,是在1543年,当时,一艘由澳门开往宁波的葡萄牙船,漂流到九州南部的种子岛。日本的战国时代,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都先后来到此地,并和各地大名有或深或浅的联系,战国时期的日本武士会用火绳枪射击,就是因为使用了这些外国人的技术。

日本的统治者可以决定和谁通商,通商的规模以及区域,他们牢牢把控主动权,也曾禁止传

教。丰臣秀吉曾一次处死了26名传教士和天主教徒。不大热衷传教的荷兰人在日本获得受限制的贸易权。

1503年,葡萄牙人在印度沿海地区建立据点。荷兰也在这里建立了据点。当时印度次大陆王侯林立。对这片大陆影响更大的是喀布尔的帖木儿国王巴布尔,1505年帖木儿首次向印度发起进攻,并最终建立莫卧儿王朝,将伊斯兰教传播到这里。

不能不提及奥斯曼,这个称雄一时的横跨欧亚的大帝国。1453年,奥斯曼攻占君士坦丁堡,将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作为首都。在这一时期,意大利开始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复兴的是文艺,在与奥斯曼的军事对垒上,欧洲国家持续处于下风,奥斯曼征服了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统治该地区400多年,并在1521年征服匈牙利,1529年直逼维也纳。也就是在此前不久,麦哲

伦完成了全球航行。此后150多年,奥斯曼依然处于攻势,并将克里特岛占为己有,牢牢控制住地中海东部。

可以发现,在和东行政权的交战中,大航海强国并没有占到便宜,他们占领的是像菲律宾等原来没有建立政权的海岛。他们在印尼、马来西亚取得很大成就,是因为当地还处于非常落后的部落时代,无法有效组织资源。

葡萄牙人明朝进入中国,中国按着自己的节奏进入清朝,日本从战国时期进入到漫长的德川幕府统治,印度进入莫卧儿王朝统治,而奥斯曼与亚洲国家的近距离对抗,也坚持了好几百年。在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看来,那些金发碧眼的人不过是货物的搬运工,他们带来的那些武器可以为我所用,但并不足虑,和他们贸易是赏他们一口饭吃。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